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戰前日本受西方社會主義規劃概念影響之檢驗—以日本式的「職工村」及「田園都市」為探討對象

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Socialistic Planning Idea in Japan Before Word War II : A Discussion on Japanese Style "Industrial Village" and "Garden City"

doi:10.6154/JBP.1991.6.008

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 (6), 1991

Journal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6), 1991

作者/Author : 黃世孟(Shyh-Meng Huang);吳旭峯(Hsu-Feng Wu)

頁數/Page : 91-10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 1991/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154/JBP.1991.6.008>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

第六期 民國八十年九月 評介 第 99 頁~109 頁

JOURNAL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UMBER 6, SEP. 1991, REVIEW AND CRITICISM, pp.99~109

戰前日本受西方社會主義規劃概念影響之檢驗—— 以日本式的「職工村」及「田園都市」為探討對象

黃世孟* 吳旭峯**

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Socialistic Planning Idea in Japan Before World War II:

A Discussion on Japanese Style "Industrial Village" and "Garden City"

by

Shyh-meng Huang* Hsu-feng Wu**

摘 要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就一直積極的引入西方重要的制度與文明。而在發展工業、累積資本的過程中，日本也如同西方先進國家一般面臨了嚴重的社會及都市問題。本文主要以兩篇日本研究其國內都市計劃史的重要學者之著作為骨幹，介紹戰前日本國內受西方社會主義規劃概念影響而建設的「職工村」與「田園都市」個案，分析個案發展背景及重要的城市規劃理念。除了聯結上日本在戰前的歷史脈絡，並以批判的角度來關懷我國的居住環境及規劃上的課題。將對於國內本土的都市規劃史研究，也有相當程度的啓示。

ABSTRACT

Japan had been importing various institutions following Western models since the Meiji Restoration of 1868. However,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capitalization, Japan had met serious social and urban problems just as western countries had. It major introduced the cases of "industrial village" and "garden city" effected by the Occident socialistic planning idea in Japan before World War II, including their background and taking a historical view of them. Besides to be concerned with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prewar Japan, it has care for the issues of living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from a critical point. However, it would be revelatory for the local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Urban planning in our country.

民國 80 年 6 月 30 日收稿

*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

Manuscript received on June 30, 1991

*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 Master,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一、前言

近代的都市規劃乃源自於同時在近代工業化文明上領先的西方先進諸國。都市化的現象和問題也一直與產業革命後的生產關係和條件有密切關聯。一些針對城市的居住與工作環境而反應的社會主義思想起初是為關懷普羅階級的生活，進而為疏導城市過度膨脹以及環境品質惡化而描繪理想城市藍圖，這些社會主義思潮乃成為近代城市規劃概念的一部份重要來源。

日本是西方先進諸國以外第一個近代化最為成功的國家，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以西化為目標，力圖建立一個具有西方近代文明的國家，努力引進西方先進諸國的政治、經濟、社會以及科技等制度及文明。事實上，從今日看來，在其發展有成就結果之背後，此一歷史過程也不斷地反映出日本本身社會的問題。日本致力於近代城市規劃一百年來，也同樣地持續著此種情況。對於同樣位於太平洋岸的我國而言，過去曾受到日本發展經驗的影響，往後也經常是我們所參考與學習的對象，而兩地由於社會背景較為接近，在上述發展過程中所反映出的問題，經常可以讓人感覺出相當雷同的現象。

本文主要是藉由兩篇各由日本近年來研究其國內都市計畫史的重要學者，針對戰前規劃上的重要個案所做的研究之詳介，來看當時日本受西方社會主義思想所衍生的規劃概念之影響，在其國內從事都市計畫史的研究也有相當程度的啓示。

第一篇是渡邊俊一（Shun-Ichi J. Watanabe），1980 “Garden city Japanese style: the case of Den-en Toshi Company Ltd, 1918–28”, in *Shaping an Urban World* ed. by Gordon E. Cherry. Mansell, London. 渡邊俊一現為東京理科學大學建築學科教授是日本國內研究都市計畫史相當重要的學者。（註1）

第二篇是石田賴房（Yorifusa Ishida），1990 “Japanese industrial villages and a reformist factory owner” in *Planning Perspectives*. 5: 295~305.

石田賴房現為東京都立大學都市研究中心教授，對於日本國內都市計畫史有相當深入的研究，相關著作頗豐。（註2）

二、社會主義規劃思潮

工業革命為人類的生活方式帶來巨大的改變，隨著經濟及社會條件的變動，城鄉關係失調。而在工業生產的中心——工廠，受資本金壓迫的工人面臨著居住以及其他生活上的窘境，並使得居住問題混雜著其他都市問題，不再僅停留在單純的實質層面，而受著經濟、社會甚至政治等

結構因素所錯綜影響。

正當工業化的浪潮以洶湧之勢向歐陸及北美推進之際，各種懷抱人道精神的社會主義思潮也開始出現，有些並具有強烈的改革色彩，而對於工人居住環境的關心，更是其中的一大重點。從十九世紀初期就有許多社會主義理想城市的構想出現，而像職工村（industrial village）、公司鎮（company town）的產業社區型態也是基於理想城市概念的一種實踐。

除了一些烏托邦計畫之外，有一部份源於上述理念的產業社區，如英國的 Saltairs（紡織產業社區）（圖1）、Bournville（巧克力工廠產業社區）（圖2）、Port Sunlight 以及德國的 Krupp Colonies（鋼鐵產業社區）等，不僅付諸實現，並獲致良好成果而成為頗富聲名的成功例子。於是也激起了一些有心人士仿效之意。

對於遠在東方但刻處於積極地向西方學習時刻的日本而言，這些獲得好評的產業社區也陸續為其所知曉。於是早在 1870 年代，即有日本方面派出的考察團體，至英、德等地參觀拜訪。自然也將這些源自社會主義規劃思潮的產業社區狀況向日本國內傳播。

而產業社區的發展在十九世紀末期至二十世紀初期於歐美產業革命先進國家也正是方興未艾。就在 1898 年，英國人霍華德（Sir Ebenezer Howard）所提出的田園都市（Garden city）觀念，掀起了計畫市鎮發展的新頁。霍華德的田園都市觀念的發展其實正深受前述社會主義思想的產業社區理念所啓發。他認為理想的社區應具有三個主要特質——土地為公共所有或控制；整個城市應有完整規劃，以維經濟及社會上的平衡；且應有一永久綠帶包圍著城市（圖3）。

霍華德以此一兼容都市與鄉村特點的城鄉為區域發展的基本單元之觀念雖未獲完全採用，但卻啓發了近代都市計畫中自足式新市鎮的觀念，並廣泛地激起世界各地社區開發建設的反應。在英國本地第一個田園城市隨後在 1903 年建於倫敦近郊的雷屈渥斯（Letchworth）（圖4）；1919~20 年，在倫敦以北 20 哩處的維爾溫（Welwyn）規劃建設了第二個田園都市（圖5）。

三、戰前日本住宅發展歷史背景

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在經濟方面搶搭西方國家產業革命的列車，力圖在原處於弱勢的不利地位開創新局。而在政治、經濟及社會環境的劇烈變動下，日本在許多方面也步上英國產業革命早期的後塵，快速的工業化和都市化連帶產生了嚴重的都市及住宅問題。日本國內最早的近代都市計畫事例為明治 5~10 年（1872~77）的「銀座煉瓦街」市街整建計畫，但進一步較具整體性的都市計畫則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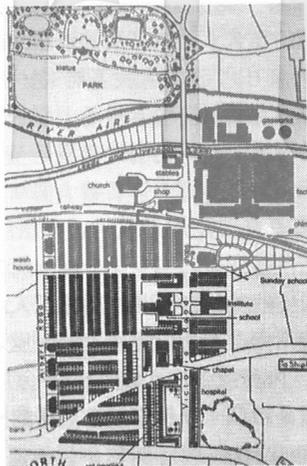


圖 1 Saltaire 紡織工廠社區（英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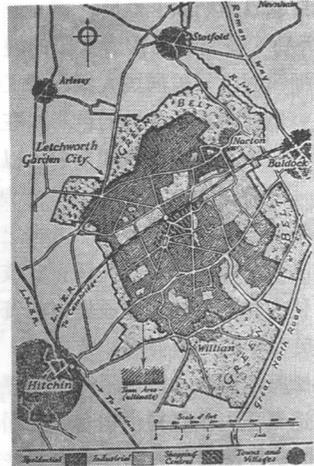


圖 4 Letchworth 田園都市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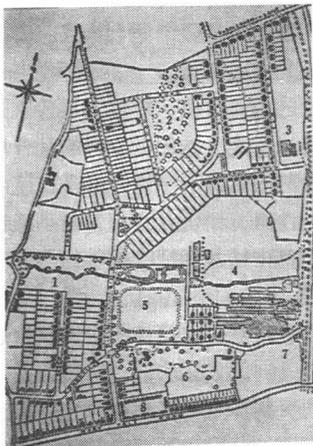


圖 2 Bournville village（英國），是在伯明罕市以 Cadbury's 巧克力工廠工人居住為主的產業社區。



圖 5 Welwyn 田園都市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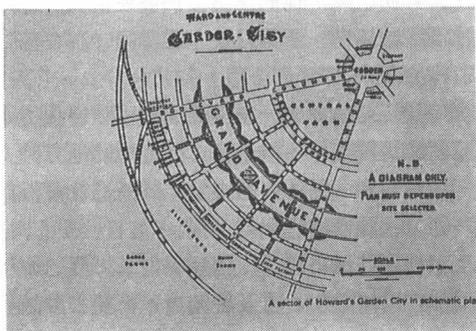


圖 3 Howard 的 garden city 概念圖示

十餘年，直到 1888 年首次公佈東京市區改正計畫及條例。

由於明治政府的富國強兵政策，以發展國營企業及保護民間企業使產業的資本主義化急速地進行。明治 27 年（1894 年）及 37 年（1904 年），分別在日清、日俄戰爭中獲勝，更進一步使資本主義趨於發達。

戰爭刺激了工業的發達，但是另一方面也因而引起了諸多的社會問題。機械文明的擴展、勞動力需求的增加，使得舊社會結構進一步崩解，勞動力需求也開始轉向較廉價的女性勞工。戰爭後急遽的通貨膨脹，使更多人陷入生活的困境。而人口大量往都市集中、地價高漲也使住宅開

題趨於緊張，階級對立日漸明顯。此時，職工的疾病率增大、連續 36 小時勞動、被監禁於宿舍女工的燒死、工廠中的懲罰作為，漸漸喚起了一般國民大眾對勞工的同情，勞工問題、勞工運動也就帶有社會性的色彩。在這樣的背景下，原來一直受制於企業方面長時間反對，以保護勞工為考慮的「工廠法」終於在明治 44（1911）年制定。

回顧日本勞動階級的居住條件，在十九世紀末年仍然十分惡劣。早年有許多在現代化工業擔任正式技術人員或日班勞工的工人，住在背對背的長屋或城裏的貧民窟中（圖 6）。之後，由於日本的工業發展非常迅速，一些資本家，特別是一些紡織廠的雇主，雇用了很多年輕的女工，而且是從鄉下找來這羣工人並且提供宿舍或公司的房子給他們住（圖 7）。但這些地方的設備並不比那些城裡的長屋好，有時還更差。其實一直到 1940 年代，一般日本工廠的女工宿舍仍不過是一些把工人們栓在工廠的營房。

1899 年一個著名的社會主義新聞記者，報導描述低工資、長工時、難以置信的勞工境遇以及勞動階級窳陋的生活環境。他同時提到紡織廠中的女工宿舍，這些宿舍的房間大約有 20-25m² 大，但是也有一些例子是在 50-65m²（密度 1.3M²/人）的大房間中擠了四、五十個女孩子。



圖 6 日本舊時長屋的生活（取材自橫山源之助《日本の下層社會》明治 36 年（19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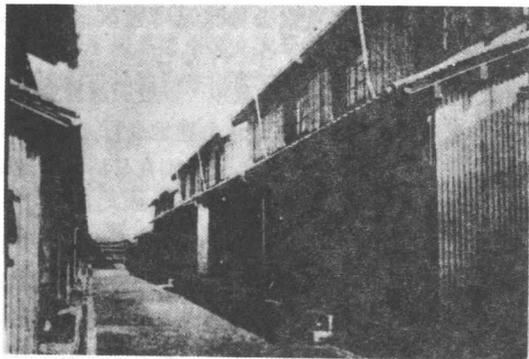


圖 7 當時的職工住宅典型（大阪紡績三軒家的社宅）

1925 年另有一個曾在紡織廠工作 15 年之久的記者，注意到紡織廠的宿舍不是以高高的磚牆圍起來，就是用其他堅固的材料釘在頂部或環繞著溝渠，看起來活像是堡壘。這些堡壘不是建來防範入侵者，而是要防止女工們逃走。根據他的報導，女工宿舍的典型是一個龐大的木造建築物，沿著幽暗的長走廊分佈著數十個鋪榻榻米的房間，由於平面規劃不良及使用紊亂，甚至被指為是「豬舍式」。聚居的密度據說是每個女工分配一塊榻榻米，更有甚者是房間以及不收拾的被舖是由日班工人和夜班工人接著著在一天中使用兩次，所以實際上的密度是兩倍的。

1927 年，內務省公布工廠工人宿舍規則，但他們所提出的標準還是很低。舉例來說，聚居的密度是每個人不得少於 2.5m²，而且每個房間禁止住超過 16 個人（密度約 3.2m²/人）。

四、領導人物背景

本文的焦點對象是戰前的日本式「職工村」——產業社區及日本式「田園都市」——城郊住宅社區。這兩個在日本規劃史上的重要案例，事實上均透過一個代理人的角色人物而得以發展，他們在當時的社會均具有相當的地位，也對社會的改革保有熱忱。但是在這兩個案例的發展上，在角色及性格方面仍存有相當的爭議性。

在「田園都市株式會社」的整個事業中，影響力最大的即為澀澤榮一（1840-1931）。澀澤是在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最成功也最富公共精神的企業領袖之一，基本上他也是為使日本邁向現代化的許多跟隨西方模式的新的社會制度的創始者。澀澤本身創建或合作許多的企業，他不僅是日本第一家股份公司和其商會的創辦人，也活躍於公共事務與慈善事業，也因此他在後來獲冊封爵位。

澀澤榮一爵士經常勉要做整個企業的先鋒，但就田園都市株式會社所記錄的情形來看，他更像是一個組織者而不是發起人。1915 年 3 月一羣東京附近鄉下地區的農田地主來拜訪澀澤，他們提出一個發展他們的土地的構想並請求澀澤的協助。兩個月後，澀澤第一次在他日記中提到了「田園都市」。

那時候正是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致現代工商業快速向東京都市地區集中，但是都市外地區的地方勢力，並沒有足夠的財力和一點約束的力量，郊區進行著漫無秩序的發展，而且土地價格也開始上揚。

這個地區離都市較遠，仍然保留著鄉間的原貌。由於此地並非在東京市中心可及範圍內，而前去拜訪澀澤的這些地主們大多是此地區的人，他們很想知道怎樣才能藉他們的土地也讓他們分享到如同一些地區般的驚人利益。值得注意的是這整個企業一開始就是由一羣充滿投機心態的

想被稱為「職工村」的例子下，決定建立一個日本式的工業村。

大原氏會成爲一位改革主義者是受到三位人士的影響：山川均，一位著名的社會主義者，是日本共產主義運動的共同創始人，也是大原從小就在一起的朋友；林源十郎，是山川的姻親，一位倉敷的基督教聖公會的信徒；還有石井十次，一位基督教社工人員，在岡山縣開設一間育幼院以及其他福利機構。

1899年，當大原結識石井十次後深受石井的基督人道主義影響，一面大量資助石井的社會工作，更設立倉敷教育講話會（講座），透過社會教育來投身社會改革。在1905年，大原受洗成爲基督徒。

石井十次成立了一個叫「愛染院」的社會福利機構，是位於大阪一處窳陋區愛染橋，裏面有護校和夜校。而從事勞工問題和社會福利研究的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最初也是1919年在愛染院設立。

據說大原對歐文以及他的實驗相當感興趣。而由他在德國的一位朋友告知他的克勒普（Krupp）工廠的聚居社區中工人福利體系和福利設施，使他注意到了克勒普的工人和倉紡的工人間的差異。大原也想在他的公司組成一個工人互助體系。

1906年，大原孫三郎繼承了他父親的事業成爲倉紡的總裁。然而在他的工廠中工人們悲慘的狀況卻被當時一些期刊報導引爲國內的惡例，成爲他要迫切解決的問題。倉紡的女工宿舍甚至比日本其他的紡織工廠還要髒亂。在1900年代早期，提供給超過1100名女工的倉敷工場宿舍樓地板空間大概只有2000m²，也就是說一個工人還分不到一塊榻榻米。於是乎在1906年爆發了傷寒熱流行，導致包括七人死亡，多人受害的事也就不足爲奇了。

五、日本式「職工村」——倉敷紡績職工村

在倉紡條件如此不佳的情況下，1907年大原開始大刀闊斧地展開宿舍的改善計劃，他提出一種新式的宿舍稱之爲「分散式」。此「分散式」宿舍爲單層，中間隔有花壇，每排連幢房屋中包含數個單位（圖8）。在樓層平面則接近市街上長屋形式的住家房屋，在新宿舍啓用的同時，大原向股東們解釋他的「分散式」的理念，考慮到新宿舍會使女工們感覺到自在，因爲這些房間是仿照他們的長輩在鎮上的住家所設計的。不論如何，奇怪的是這些女孩子大多是來自鄉下而非城裏，卻也對這些新宿舍感覺很好。

經過了六年的建設，在1914年完成宿舍區及工廠是大原建立日本式職工村的第一步。1912年，倉紡計畫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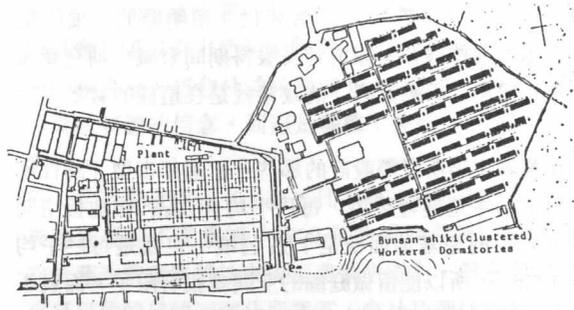


圖8 倉敷工廠的改良式職工宿舍（分散式）

地主，而非如霍華德般懷抱改革的社會運動者所發起的。

老謀深算的澀澤先從他國外的見聞中看見了城郊生活的本質，他相信居住和工作的分離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郊區住宅具有相當潛力的廣大市場。再者，他深黯如何來組成一個開發郊區而能夠快速回收利潤的公司；又他的威望也有助於在公司的土地取得，特別是來自地主們很大的信用和合作。

簡言之，澀澤扮演了一個組織地主、投資人、經營者以及後來田園都市住戶興緻的樞紐角色。

而一手創建倉敷紡績株式會社「職工村」的大原孫三郎（1880-1943），大概是戰前的日本工廠資本家中唯一的改革主義者。他在日本極少有改革主義者，工廠資本家設一個新廠——萬壽工場在倉敷車站的北方。在規劃萬壽工場時，大原根據他的「職工村」理念採取新步驟。他想要以建設勞工家庭來完全取代單身勞工宿舍。所謂的「勞動家庭」，在這個案例中，意謂一個家庭有一名女性勞工，她的配偶以及女性親人勞工。

在著手此一新廠計畫時，一份內部報告由其個人管理企劃提交給大原，指出以雇用家庭成員要比雇用單身的勞工更能延長工人的服務且降低工資成本。這份報告提議要公司改變其勞工管理政策，從建設提供給單身員工的宿舍轉向提供給勞動家庭的社宅。根據倉敷工場及玉島工場的統計數據可以預計有0.98個男性工人及1.78個女性工人來自每個勞動家庭。

在那時，對於紡織業而言，最關心的就是如何降低工資，如何使他們的工人更賣力工作。但這兩方面經常是相互衝突的，因爲要迫使工人更賣力，他們會厭倦甚至逃離工廠，而資方就得去找來新的工人，因而付出更高的重新訓練成本。而採取一個大家長式的作風，是日本工廠資方把工人拴在他們的工廠的策略。在倉紡每一年（從1906~09年平均）新雇用1276名工人，比起同一期間結束時還留下來的工人數還多276人。爲什麼要補充這麼多新手呢？以下的數據提供一個清楚的答案。在同一時期的平均

每一年，有 18.4% 的工人因病、20.8% 由於其他原因而被解僱，超過 39.1% 離職，1.6% 死亡。很明顯的，要降低工資成本的最佳機會是藉由延長服務期間來減少補充新血的支出。雇用「勞動家庭」的政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策劃的。

在萬壽工場所實際設計的那些「田園都市型」的社宅是一層樓的木造連幢房屋，每戶平均有 33m² 樓地板空間，建 600 戶的總基地面積是 7.35 公頃，也就是每戶平均基地 123m²，所以能留做庭園的空間就很有有限了。而且工人們是兩班制長時間工作，極少閒暇來整理庭園。圖 9，是萬壽第一工場的平面計畫，建立一個會社的住宅（社宅）羣，稱為「職工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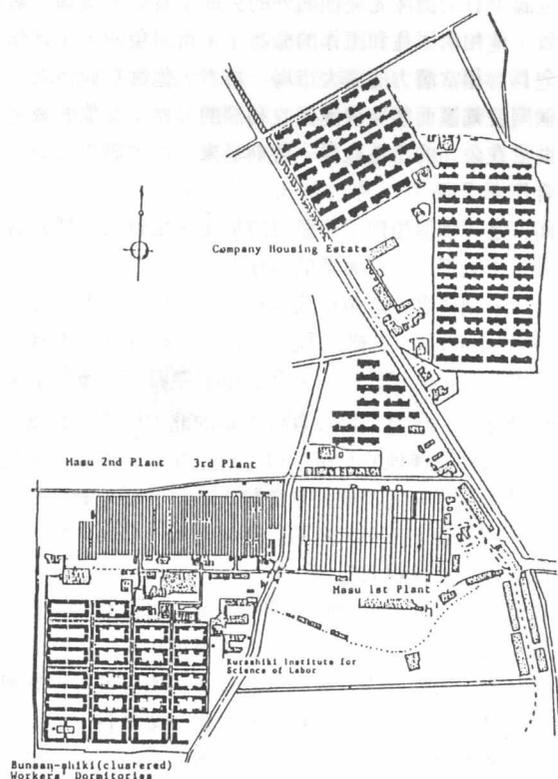


圖 9 大原氏「職工村」：包括社宅羣、工場羣及宿舍羣的萬壽工廠配置圖

根據「職工村」計畫，萬壽第一工場的男性工人應佔全部工人數的 37%，要比當時一般紡織廠 18% 的數字所預期的要高。隨著一次大戰結束後的經濟繁榮，男女性工人間的不均衡比例漸成為公司頭痛的問題，主要還是考慮到萬壽工場的生產力。後來公司放棄了以社宅家庭來增加工人的人事政策，而在 1918 年再度開始提供女工宿舍，從原來萬壽第一工場給勞動家庭的社宅改成單身勞工宿舍。1918 年起，鄰接第一工場的萬壽第二、三工場，有

了 66 幢新的分散式宿舍。大原氏曾說過他覺得從遠處雇用工人且迫使他們去住在集中的大宿舍中是不合情理的，而且最好是以一個「勞動村」的方式來建設工廠。但在改變人事政策時，他卻說是情況迫使他必須在第二、三工場興建相同的宿舍，雖然他覺得此項政策改變，並不只是一項暫時性的倒退做法。

早島工場在岡山，比倉紡的其他工場規模要小，被視為是一個新系統的實驗性工場。1912 年，在早島工場的革命性計畫，大原希望在工場基地南側新的社宅建設中增加一個果園。據說將會把種在大原農場的果樹苗移植，他想要藉由他的農業振興活動，來結合職工村理想的實現，不過此一計畫現況已不得而知了。

六、日本式「田園都市」——田園都市株式會社

田園都市株式會社是在 1918 年由包括澀澤在內的八位發起人發表了會社的創立書，它表示城市的過度擁擠以及農業的崩潰是彼時的重要問題。這份創設宣言指陳，若能夠根本而長久地解決此一問題的辦法之一，便是「鄉村生活的重建」，藉著將過剩的都市人口移回鄉村地區可舒緩不同的都市問題，並建立健康的鄉村生活。

創設宗旨據說是依據 Garden city 的方針為構想，田園都市將成為以往飽受不方便生活、不衛生的條件和精神威脅，在又擠又髒的首都城市成為中產階級家庭的理想居住場所。創設宗旨強調這裡將有郊外的清新空氣，以及有充足設施和服務的健康而方便的住家。因此，這些發起人把公司的性質定位為不動產企業，而且顧客為中產（但實際上是中上）階層，對這些人來說，在過去郊區生活是一個夢想（圖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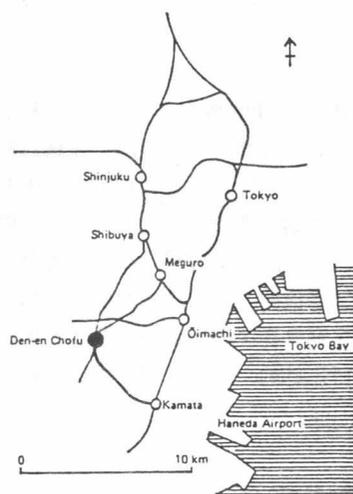


圖 10 田園調布區位示意圖

會社計畫開發一個 138.6 公頃的田園都市，而且已經申請了建造連接田園都市與東京的城郊鐵路路線的執照。最初的階段，會社興建了 500 個住戶，一開始是以合理的價格出租給中產階層的家庭，而且可以按年分期付款的方式在最後才會擁有房地。

這份創設書指出這家私人公司的公共性質並且敘述其投資潛力。公司希望提高郊區土地價值可以在幾年內創造 7~9% 的年股利，這也相當明顯標示了和英國田園都市運動的不同，後者一開始就想將每一期的股利限制在 5% 之內。

1918 年 9 月 2 日，此公司以 50 萬圓的資本額設立，而且資金很快就增到 100 萬圓，1920 年 1 月再增加到 500 萬圓。公司原先有 11 位股東，大部份是商紳人士，熱心地回應澀澤的觀點，其中有六位並擔任董事。澀澤本身是最大的股東之一，並未擔任董事長，但乃參與重要的決策。他後來派他兒子做了一次九個月的海外旅行以考察田園都市，回國後小澀澤即加入了董事會。

該會社真正意圖是在東京郊區建造一個「田園都市」，並出售土地於買主。這是一種相當新型態的不動產企業。事實上，這個公司更像是一個房地產開發商。它不僅要開發住宅區再分割以便出售，還要有一些因應郊區生活所需的公共設施和服務。

這個公司所開發的土地是鄉村的農地，幾乎沒有都市中產階層所需的設備和服務，會社必須要做安排。它要求政府提供警察、電信及郵政服務，以及一個水公司以提供用水。但電力公司不肯服務田園都市，因為距離建成地區太遠了。會社只好負起供應電力的責任，先從電力公司買電，再「零售」給住戶，後來因為住戶增加也成為一項有利可圖的事業。

最嚴重的問題還是和東京市中心的聯繫，1922 年會社另外成立了目黑（Meguro）—蒲田（Kamata）電氣鐵道株式會社建設自己的支線。1928 年 5 月當所開發的大部份土地已售出，田園都市的形貌也已清晰具現時，這條鐵路取代了它的母公司經營權。

會社成立後起初計畫要得到 130 公頃的土地，但飆漲的地價迫使會社要修正一部份預定地點和面積的計畫。這顯示出此一田園都市並沒有像英國的田園都市般的人口計畫，它所關心的僅止於土地本身，而非土地上的人口或生活形態。就這樣會社盡可能既快速又廉價地取得更多的土地，到 1921 年 11 月底，會社已擁有了將近 150 公頃的土地，而有 98% 過去都是農林地。

會社並沒有完整取得一塊方正格局的土地，而多少呈一不規則的約 3.4 公里長，0.2—1.2 公里寬的帶狀，距離東京市邊緣最近的角落大約有 2 公里遠。不論如何，土地的取得還算是成功，會社已經獲得比原先計畫多出很多的

土地。取得的成本愈高，後來土地細分後就以愈高的售價來平衡，而位處偏僻以及基地不規則的外緣都不成問題，因為會社可以自由地決定服務田園都市的鐵路和車站的位置。事實上，該會社並未堅守 Garden city 必須是獨立且明確的實體的信念，而這是偏離了英國 Garden city 的理念的。

當這家會社成立之初，日本尚未有都市計畫法令，發展郊區更是不受重視。1899 年的耕地重劃法原始目的是在於藉改善實質耕地來提振農業生產力，但它卻常被利用來為居住的目的而細分農業區，會社挑選地勢高、排水良好而沒有建物的農地，透過法令很容易就變更成為可供出售的住宅區。由於缺乏法令的分區，會社將大部份的私人土地設計為住宅區，而其他則為鄰里商業設施。必須提醒的是，田園都市幾乎完全是以私人企業方式開發而沒有法定的計畫。

在所有 150 公頃的土地中，田園都市株式會社在其 10 年的營業期間賣掉了 106 公頃，其他則是一些街道（包括人車分離專用道）、公園和其他公共空間（面積約值 30%），有一部份土地則由該會社和它的關係企業所使用。

會社大略將土地分成三個分區：洗足區、大岡山區和多摩川台區。會社稱整個開發案為「田園都市」，所以此日本式的田園都市是由這三個部份的開發所組成的。其中多摩川台區是最具代表性（圖 11），這是其中最大又最好的一塊地，大部份位在美麗的山坡可以眺望富士山和多摩川。會社的介紹描述這裏是「田園都市未來的中心」。



圖 11 田園都市多摩川台地區平面圖

此區的配置是在 1922 年末才開始，1923 年 8 月才第一次申請重劃。東京震災後的隔月，也就是 10 月，最早的 10.7 公頃開始出售，每坪土地的平均價格是原來取得時的 8~10 倍。多摩川台區是分成八次細分及出售，雖然一再地開發，配置仍保持連貫性並給住戶一種身份地位的

感覺（圖 12～圖 16）。現在的田園調布包括了大部份的多摩川台區，而且已經成為最富盛名的郊區。

當田園都市株式會社在 1918 年創設之時，正是日本國內經濟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景氣蓬勃的時候，但很快的戰後嚴重的世界景氣衰退接踵而至，1925 年到 1927 年間跌到谷底。但是該會社卻是一直保持其股利水準，當許多其他的企業甚至破產倒閉，會社在 1927 年時分配了一次額外的 20% 特別盈利。就在國家處境艱困的情況下，田園都市株式會社算是一個奇蹟。

這種高水準的盈餘顯示會社的本質其實是一個營利事業而非社會運動。在英國雷屈渥斯（Letchworth）的例子中，田園都市先鋒公司差不多將近 20 年才得到這家公司一開始的配利水準。

澀澤能夠認定郊區生活的潛力是值得肯定的。但有識者卻不能不重視其中的機運成分—關東大地震。1923 年 9 月 1 日芮式地震儀 7.9 級的大地震襲擊了日本的首都圈，地震和大火涵蓋了大部份的東京中心。然而，田園都市的住戶卻只遭致輕微的損壞。田園都市的景緻和浩劫之後的東京市區的殘破景象成為強烈的對比。

東京的震災加速了都市中上階層移往郊區，城郊成為一些人的天堂，而此時恰是田園都市的銷售時刻，使得這家公司佔盡了優勢。

企業的成功卻也縮短了這家公司的生命，當它所存的土地都售出後，就沒有再存在的必要了。1928 年會社被裁併入它的旁支企業的鐵路公司。於是，日本第一個也是惟一「田園都市」公司結束了它 10 年的生命，而整個歷程一直在那時已經 88 歲的澀澤爵士的關照注視下完成。

七、結論與檢討

在倉紡的「職工村」案例中，雖然大原孫三郎深切的關心社會改革，也意圖以此理念來管理他的工廠，但是他的成就卻遠遜於其他國家的企業家。為什麼大原的社會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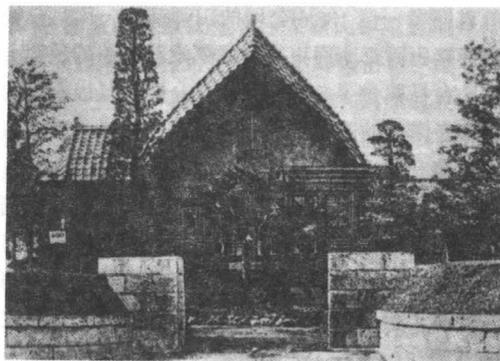


圖 13 多摩川台區住宅外形式樣



圖 14 多摩川台區住宅外形式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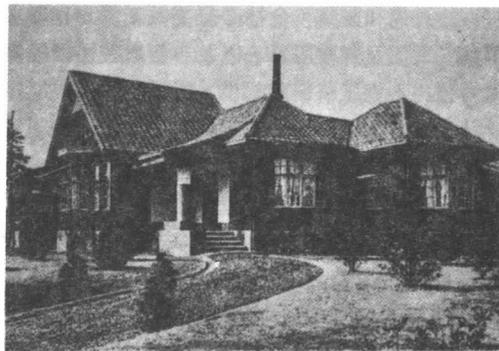


圖 15 多摩川台區住宅外形式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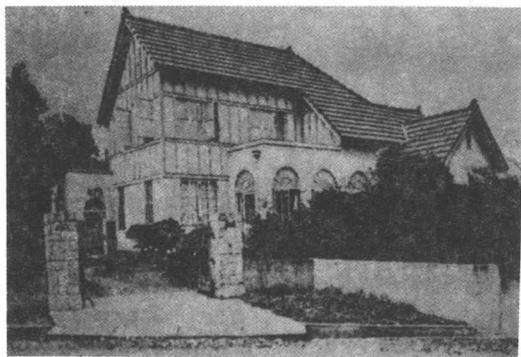


圖 12 多摩川台區住宅外形式樣



圖 16 多摩川台區住宅外形式樣

革仍未能趨於成熟呢？這可能是因為在日本低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使他的改革之途多艱難。曾有一位日本紡織業的領袖說過，「要用和英國人所用的相同方式來趕上英國的紡織業是不太可能的。惟一可能的途徑就是更努力地工作，以英國的兩倍甚至三倍的時間來做。」他嘴上是在講更努力工作，但他很可能是要說：「讓工人們更努力工作」。日本的紡織業並不能藉著迫使其女工處於不良的工作環境就能和英國人競爭，而倉紡既非日本紡織業的龍頭，也不是政府支持的企業。只是一個地方性的企業，而且在想趕上英國之前還得請面臨日本同業的競爭。就算大原自認為是一個改革主義者，他仍然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資本家，而且也不能忽略他本身的身分，甚且倉紡也不能夠說爲了要接受大原的理想而忍受高昂的勞工成本。

有另外一個觀點指出，大原並非是一個真誠的改革主義者，只不過虛有其表而老算計自己的利益。基於此一觀點，他自「職工村」理想退卻並不違悖他的意願，而且還是遵循著他圖利的經營政策。即使這樣的觀點能夠成立，事實上大原的理想和成就，仍值得在日本的規劃史上記上一筆。

至於本文的另一個探討對象——田園都市株式會社，顯然它和霍華德所以爲的 Garden city 是兩回事情。它所開發的三個地區既非三個分離的田園都市，更不是一個整體的田園都市，頂多也只能算是田園城郊（garden suburb），它們沒有一個是機能獨立的城鎮，均高度倚賴以東京爲社會、文化與就業中心；雖然它們全爲農業區所環繞，但卻不是爲社區所有的綠帶，而是具有都市發展潛力的地區。因此，田園都市周圍蔓延發展是難以避免的，這個發展只是依隨著地主們的「計畫」；對會社及住戶而言，這也意味著它們的土地價格上揚；對鐵道會社則是旅客的增加，這真是皆大歡喜的蔓延發展。值得注意的是，會社從未認真想照霍華德的模式來創造一個田園都市。澀澤把田園都市視爲是東京郊區，同時保有一些鄉間的特色；當他寫道：「扼要地說，田園都市就是一處充滿自然氣息，融合城鄉性質與鄉村魅力的城鎮」，他也從未夢想過要一個獨立的鄉間城鎮。

這提醒了我們，田園都市的全盤理念就不少人而言都缺乏認知，特別是英國以外的人士，使得它可用以指大部份的事物。這般曖昧、模糊的狀況似乎是何以田園都市概念能傳遍全世界的原因之一。換句話說，從英國傳譯到其他國家的通常僅是田園都市的這個「文字」（word）而非其「觀念」（concept）。原始的理想常被他人所誤解，甚至有時被一些深黯「田園都市」在城郊市場上是個誘人的招牌的開發商所故意曲解。

在這個私人企業仍在經營時，都市計畫法在 1919 年實施，但卻證明了會社難以用規畫管制或公共協助。公部

門計畫基本上關心的是提供都市區的街道和其他基本公共設施；而在郊區，一家私人公司正以一種制式計畫所難以達到的環境品質來建造「田園都市」，二者是毫不相干的。諷刺的是，沒有公部門的規劃而全由私人企業來做卻創造了良好的環境。

總之，會社所做的還是有很多的限制，首先，它一直沒有如同霍華德的田園都市協會般地成爲一種促進更佳都市環境的社會運動，相反的，它仍只是一種中上階層的自助運動；第二，它證實了使郊區生活確實地普及起來，但它並沒有探討到都會區持續成長的問題，它只是關切如何解決住宅和其環境問題，而非背後的社會及政治問題；第三，它證實了都市外圍地區的廉價土地也會變成昂貴的商品，特別是如果興建了一條新的鐵路，像這種結合土地發展和鐵路企業的方式，已經成爲日本典型的大規模城郊發展的形態。因此，地價的增加或英國所稱的「土地改良」經常成爲受開發—鐵路公司而非政府所支配。

另外我們來看看兩個案例戰後發展的情況，倉敷市的大原產業村和英國類似的產業社區，但仍保持著他們良好生活環境的薩爾提、波衛勒和陽光港（Part Sunlight）的情況大異其趣。倉紡的倉敷工廠在二次大戰的末期變成軍需品工廠，並且在 1945 年停止其生產。1969 年時，保留下來的廠房做其他用途：包括旅館、餐廳、商店，兩個美術館和公司的紀念博物館。而就在近鄰的工人宿舍則已拆除，該基地現在是倉敷市的市民公會堂、停車場以及蘭花溫室和餐廳。

而公司的萬壽廠仍繼續操作，鄰近萬壽廠的大原產業村的社宅仍有部份保留下來。原來這裏有 600 戶住宅，現在大概只剩三分之一，包括留下的許多空屋。這些僅剩的房屋仍屬會社所有而且還出租給工人，會社也打算在房子空出來後一個一個地拆除。

而原文指出對田園都市株式會社提出許多的質疑似乎有欠公允，畢竟它也只是個私人企業，這家公司是在日本的都市計畫史最初的階段中提升居住環境問題的案例之一。而這個多少是日本惟一的一個明顯受英國田園城市影響的社區開發案在超過半個世紀後，所在的田園調布區以其出色的實質環境和有名望的住戶而聞名，整個地區已是衆所周知東京最佳的住宅區之一。

八、範型轉移（paradigm shift）之省思

本文介紹了兩篇各由日本研究都市計畫史著名的學者，針對其國內都市計畫史上兩個重要而特殊的個案所做的介紹和批評。這兩位作者均將探討的對象的背景指向西方社會主義規劃概念，並很深入地考慮到本地的歷史脈絡。

渡邊俊一先生甚至提醒歷史顯示規劃理念的國際性交流豐富了現代的都市計畫，卻也會因為對原始概念的誤解甚而全然地只搬來了一個規畫上的空殼，對這樣一個現實的研究會找出一些各國規畫體系背後所隱藏的社會歷史事實。

本文的目的除了在引介日本都市計畫史研究的一些內容外，最重要的還是希望經由批評的過程來省思台灣的「規劃進口」及「範型轉移」的事實。台灣的都市計畫幾乎完全是從國外引進的產物，然而這樣的移植過程以及在本土的適用性的檢討的重要性，應該是比規劃概念和理論本身的認識更重要的。如果只是自認中立地引入一套不帶原產地性質的技術或規劃概念，而割裂其與社會的連結，結果很可能不僅學得荒腔走板，甚至還會造成有違初衷的不良後果。

再從原文所探討的主題來檢視本土的歷史，在台灣事實上也不難找出類似的案例——提供職工住宅的產業社區；打著「田園城市」旗號的郊區社區開發。當然在看這樣的一些個案時，我們可以從意識形態的分析的角度，也必須從歷史的剖析來了解；究竟這些個案對於整個時空的發展有什麼意義；又反映了什麼樣的事實；對於我們的環境規劃又有什麼樣的啓示。

在這兩篇文章中，另外暗示了一個課題是公私部門在規劃事務方面的態度，在社區開發方面民間部門一直是比較積極的，並且也能夠促成較佳的环境品質。公私部門間角色的合作、競爭乃至衝突，一直是規劃事務上的重要課題。然而大眾似乎只能處於一個被動的選擇，甚至是被迫接受的地位。特別是在台灣，這種情況是特別嚴重，不僅是公權力不張，民主程度更是不足。而儘管本文所介紹的倉紡職工村和田園都市株式會社皆由民間部門所推動，但歷史也告訴我們，良好的制度與環境並不能只靠有良心或睿智的資本家，出自於社會的反省，自律性的開發仍然是有效的。

最後我們回到本文一開始的主題，雖然倉敷紡績的職工村和田園都市株式會社均受到相當的批評，但無可否認它們均是當時社會的異數；雖然在動機上均各有可議之處，但仍然是反映了一種理想社區的形式的實踐。我們甚至可以說都市與社區規劃，基本上都是在尋求比現狀更好的理想境界，而每個不同時期所出現、風行的規劃理論與範型也是在表達這個情況，而且也是反映當時的社會經濟背景。對於理想社區概念的相關研究，不僅在都市計畫史方面值得肯定，對於整體都市計畫而言亦是頗具意義的。

最後，筆者評介本文主要目的，為提醒台灣都市計畫界學者，聰明地來省思規劃範型的國際傳播問題。當日本學者極力批評該國只效學規劃範型的「形式」，而根本無法達成規劃理想的「原意」時，今天在台灣有許多開口閉口總是日本經驗的「傳播人」——也許是留日學生、也許

曾訪日官員，也許只是遊日觀光客，經常誤解了日本的規劃原意，而只是取其字義，引入台灣的規劃體制內。假如要避免此種諷刺的事實，就應該忠實從都市計畫史教訓中來學習了。

註釋

註1：渡邊俊一先生係1938年生，1961年東京大學畢業，1964年哈佛大學碩士畢業。曾任東京大學助教，建設省建築研究所部長，東京工業大學、筑波大學兼任講師，東京大學工學博士。由於早年留學美國，英語能力強，是日本國內都市計畫界一位活躍國際舞台的學者。主要著作包括下列三項：

(1)渡邊俊一

1976 〈アメリカ・イギリス 都市計畫文獻ガイド(第1部)〉《昭和50年代の地域開發を考ふるための地域開發關連文獻に関する調査・報告書》1-56，日本地域開發センター。

(2)渡邊俊一

1977 《アメリカ都市計畫とコミュニティ理念》技報堂出版。

(3)渡邊俊一

1980 〈都市とコミュニティ〉本間長世編《アメリカ世界Ⅱ》91-120，有斐閣。

註2：石田賴房先生係1932年生，1961年東京大學博士課程畢業，1960年東京都立大學工學部助教，現任東京都立大學都市研究中心教授。工學博士主要代表著作包括下列五項：

(1)石田賴房等

1984 《建築線計畫から地區計畫への展開》

(2)石田賴房等

1986 《集落計畫》

(3)石田賴房

1987 《日本近代都市計畫の百年》

(4)石田賴房

1987 《日本近代都市計畫史研究》

(5)石田賴房

《大都市周邊地域における散落狀市街化，規制手法に関する研究》學位論文。

近代都市計畫史之研究方法論甚紛雜，從法制史觀點的研究累積而言，石田氏為日本都市計畫界最資深，研究發表質量俱佳的代表學者。

參考文獻

黃世孟

- 1989 〈西方規劃理論在台灣的應用〉《現代科技及應用研討會論文集(都市計劃)》41-68, 台中: 東海大學。

日笠端

- 1982 《都市計畫》東京: 共立出版株式會社。

鈴木成文 等

- 1968 《近代日本における住宅問題の展開と集合住宅計畫的發展》東京: 東京大學鈴木研究室。

日本都市計畫學會編

- 1988 Centenary of Modern City Planning and its Perspective.

第3屆都市計畫史國際會議

- 1988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Planning Systems.

Benevolo, Leonardo

- 1971 The Origins of Modern Tow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Howard, E.

- 1902 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

Ishida, Yorifusa

- 1990 "Japanese industrial villages and a reformist factory owner." Planning Perspectives. 5: 295-305.

Watanabe, Shun-ichi J.

- 1980 "Garden city Japanese style: the case of Den-en Toshi Company Ltd, 1918-28" in Shaping on Urban World. ed. Gordon E. Cherry, London: Mansell.